

认知功能视域下访谈节目中的对话共振现象

韩玉婷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0207

摘要: 认知语言学出现了互动转向, 目前已经进入了对话研究时代。Du Bois基于其“用语言构建语言”的理念, 提出对话句法的概念, 从认知功能的视角出发分析话轮之间的互动和认知过程。对话句法聚焦超越句子层面的句法描写, 而非传统的线性句法。对话共鸣作为对话句法中一个核心概念, 已经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本文从认知功能的视角出发, 以某谈话综艺节目中的谈话作为语料来源, 采用对话图示和对话共鸣度作为分析方法, 主要从结构、语义两个层次探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会话者的对话和互动特征。将对话共振从认知功能的角度分为五类: 肯定、否定、修正、质疑和回应。研究发现: 1) 汉语水平较好的二语习得者的对话共振多倾向于肯定和回应的功能, 而汉语水平较差的二语习得者的对话共振仅多倾向于肯定和修正; 2) 就语义层面而言, 汉语水平不同的两个二语习得者话语中的共鸣度总体差距不大, 只在具有质疑功能的对话共振上有一定的差异。本文真实的对话语料, 以汉语为语料探讨谈话节目特定环境下会话者的对话特征, 为今后的对话句法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认知功能; 对话共振; 对话图示; 共鸣度; 访谈节目

Dialogue resonance phenomenon in interview progra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function

Yuting H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207

Abstract: Cognitive linguistics has shifted towards an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and it has now entered the era of dialogue studies. Based on the notion of “language constructing language,” Du Bois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dialogue syntax, analyzing interactions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between speech turns from a cognitive functional perspective. Dialogue syntax focuses on descriptions of syntax beyond the sentence level, rather than traditional linear syntax. Dialogue resonance, a core concept in dialogue syntax, has become a hot topic among domestic scholars. This paper, from a cognitive functional perspective, employs a talk show as a source of conversation data, utilizing dialogue diagrams and measures of dialogue resonance as analytical methods. It primarily investigates the features of dialogue and interaction amo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speakers at both structural and semantic levels. Dialogue resonance is categorized into five types from a cognitive functional standpoint: affirmation, negation, modification, questioning, and response. The study finds that: 1)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with better proficiency in Chinese tend to exhibit affirmative and responsive functions in dialogue resonance, while those with lower proficiency predominantly display affirmative and modification functions; 2) In terms of semantics, there is generally little difference in the resonance levels of utterances between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with varying Chinese proficiency, with only minor variations observed in dialogue resonance with questioning functions. Using authentic dialogue data and Chinese as the materia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alogu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locutors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talk shows, offering insight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dialogue syntax.

Keywords: Cognitive function; Dialogue resonance; Dialog icon; Resonance degree; Talk show

引言:

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提出了对话主义理论。他借鉴了索绪尔的共时性分析的方法,把它和社会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这就是巴赫金所提出的“超语言学”的方法。而对话主义在本质上又是“超语言学”的理论(萧净宇 2001)。Du Bois (2014: 359) 提出“*It takes language to make language.* (用语言构建语言)”的思想,贯穿了他所提出的对话句法(dialogic syntax)理论当中。对话句法理论通过探究对话中话论在形式上的特点,反应其在意义上特征。对话理论为句法理论提供了有用的理论框架和背景,句法理论也从多个方面继承和应用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刘兴兵 2016: 21)。

一、对话句法理论中的对话共振

与传统句法学或被线性句法不同,对话句法理论探讨的不仅仅是单个句子内部的结构,而是句子之间的特征(Du Bois 2014: 393; 刘兴兵 2015: 64)。对话句法拓展、完善了传统句法学,将其从句法层面拓展到语用层面(王天翼、甘霖 2018: 79)。两个句法理论所选择的语料也有所不同,传统句法的语料大多是脱离语境的句子,而对话句法理论的语料大多是真实的交际话语(胡庭山,孟庆凯 2015: 19-20)。

Du Bois (2014: 370-384) 提出了对话句法理论的基本概念:平行(parallelism)、共振/共鸣(resonance)、对话图示(diagraph)、复用(reproduction)、选择(selection)、对比(contrast)。其中对话共振在六个基本概念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共振意为话语之间亲缘关系的催化剂,是语篇中各要素之间关系的一种属性,因此,它不能孤立地归因于某单一因素。它代表了一个激活和阐述可比语言元素之间感知关系的某些方面的发展过程。共振可以产生在语言任何层次相对应的元素之间:符号、词语、语素、结构、音素、韵律结构、特征、意义、指称、语用、等等。共振可以是系统性的,也可以是动态的。曾国才(2015: 843)将对话共鸣的产生过程中抽象为:促发(priming)→选择→复用→平行→映射(mapping)→亲缘性感知(perception of affinity)→共振。说话人话语中的信息促发了听话人脑中对话的认知,然后听话人选择性的重复说话人言语中的部分词语或结构。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对话句之间形成了平行结构,话语之间相对应的元素相互映射。通过映射让会话者在认知中形成亲缘性感知,从而产生对话中的共振。

王德亮(2018)专门针对对话句法中共振现象,通过对比对话共振和会话合作原则、关联理论和衔接连贯

理论,提出了自己对于对话共振的界定:“对话双方语言或动作方面的关联”。根据此定义,我们可以把对话共振分为言语和动作两大类。其中言语层面包含了语音、结构层次、交际功能三大类。语音包括语素、语调,结构层次包括字、词、句式、标点,交际功能包括语义、语用。动作包括手势、眼神和其他肢体语言。

二、对话句法相关文献

对话句法理论在2014年由Du Bois提出,而在2015年就有国内学者将其理论引入中国,在介绍理论的同时,学者提出了他们认为的对话句法这一年轻理论所存在的不足或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曾国才(2015: 848)指出对话句法还需要定性和定量以及采用类型学的方式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它还不能够对于实际对话中产生的非平行话语进行阐释。刘兴兵(2015: 68; 2021: 28)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值得探讨的问题:共振的定义过于广泛;产生共振的标准是什么?共振的程度如何?对话句法的研究是否能扩大到更大时空和不同文本之间的共振?这些都是现代学者急需解决的问题。胡庭山与孟庆凯(2015: 21)指出以中文作为语料将是学者进行下一步研究的的重点。

对话句法理论被视作是认知功能主义对会话分析的最新探索(王德亮 2017; 冷玉芳 2018)。但是对于对话句法是如何表征的这个问题,连提出理论的Du Bois也没能解决。除此之外,对话句法还没有清晰和完整的理论模型,所以后面学者还需要对其进行完善和补充。高彦梅(2018)将衔接和谐中的“功能关系”概念引入对话共振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局部视角和整体视角相结合,试图解释跨越话段之间的语法、语义互动和句法浮现的深层机制。董菁、钱玲燕和陈琦(2021)将对话句法和回声话语结合起来,以医患话语为语料,建立回声三角模型探讨汉语医患会话的共振现象。孙李英(2021)把对话句法理论应用在弥补格莱斯会话含意推导存在的不足,构建了形义一体的推导模型以补充完善现有的推导模型。

从以上的文献综述可以大概看出对于对话句法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对对话句法理论的研究,包括对话句法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其存在的问题。学者多从理论的角度去完善对话句法理论;二是借用对话句法理论去解释或弥补其他理论的不足;三是采用不同的语料去分析语料中存在的共振现象。少有文献将对话句法与二语习得结合起来,探讨以汉语为第二外语的会话者对话中的共振现象。所以,本文将以汉语为第二外语的会话者

的汉语对话作为研究的语料，试图从中发现新的特征，以期对教学具有一定的启示。

三、对话图示与对话共鸣度

对话图示 (diagraph) 是语言结构的一个基本单位，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话语分析工具。对话图示是一个高度有序、“超句子”的句法结构，它是从两个或多个话语的结构耦合中产生的，通过它们之间的共鸣关系的结构化数组的映射。平行是对对话并置的话语之间的映射，唤起人们对其对应成分之间相似性的感知，结构相似程度相对较高的话语平行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复用指的是会话者重复之前出现过的词语或结构时，在这种语境下，基础和目标之间的关系变得突出。而选择指的是会话人选取语篇中的部分内容构成新的话语。

王德亮 (2018) 为解决之前学者提出的关于对话句法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了词汇语法层面的共鸣度衡量方式。共鸣度等于共鸣个数除以纵栏个数，纵栏是指对话句法分析是划分的分析单位，以这种量化的形式计算出共鸣度，如图：

		A	B	C	D	E	F	G	H	I
1	The Huntsman: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
2	Beith:			I	'm	talking	about	the	girl	.

王德亮 (2018) 将对话放入如上的表格中，可能存在共振的部分放在同一纵栏中。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本次对话被分解为九个纵栏，其中四个纵栏存在共振，所以该对话的共鸣度为： $4/9=0.44$ 。但王德亮在提出共鸣度时是以英文作为研究对象，忽略了对汉语的考虑。本文意在借鉴共鸣度的计算方法，将其合理运用在中文语料中。

四、语料收集

本文选取谈话节目《非正式会谈》第二季节目的五十期作为语料来源，自建小型语料库并将目光锁定在节目中的英国代表和美国代表。选取这样的谈话节目及研究对象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英国代表和美国代表是汉语水平不同二语习得者。英国代表曾参加国家汉办主办的中文比赛节目《汉语桥》，汉语水平也得到了评委的认可。而美国代表来中国半年时间，接触中文时间相比英国代表少很多，二者的汉语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再者，二者均来自英语为母语的母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其他因素对于结果的影响。通过对整个节目中两位代表的发言进行转录和整理，筛选出具有对话共振显现的对话共200条语料。在下文引用语料时，用代表的国籍代指代表的全名，比如“美”代指美国代表，“英”

代指英国代表，用甲乙丙丁等代指其他说话者。通过对语料的分析，本文试图探究：1) 具有不同汉语水平的以汉语作为第二外语的说话人在对话共振现象中是否存在差异，存在什么样差异；2) 说话者的汉语水平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共鸣度上？3) 影响二者对话共振现象的差异可能是什么？

五、对话共振的分类及功能

纵观语料中存在的对话共振现象，我们可以将对话共振分为两大类：词汇层面和句子层面。词汇层面的对话共振指的是说话者的内容只包括单个的字词，并不存在完整的句子，如

例 (1)：

美：他是一个高中生

甲：高中生。

美：高中生。

在上述例句中，说话人甲纠正了美国代表的错误，随后美国代表重复了一遍。但是他复用的仅是“高中生”一词，而不是像“他是一个高中生”这样完整的句子，这样的对话共振便是在词汇层面的共振。另外一种情况是说话人选择复用的部分仅仅是某一个或几个词汇，不包括句法层次的句式共振，如：

例 (2)：

甲：美国有什么好吃的吗？

美：因为是美国，所以我们的美食很多。

在例 (2) 中，大家在讨论各国的美食。主持人向美国代表提问，借此引出美国的美食。美国代表只是选择性复用了说话人甲中词汇“美国”，而从句子层面看，他并没有复用说话人甲话语中的句法结构，所以就不存在句子层面的对话共振。

而句子层面的对话共振与词汇层面相对，即便共振的部分是字词或词组，但是说话者的内容是完整的句子并且在句法结构上也存在共振，如：

例 (3)：

	A	B	C	D	E	F	G	H	I
美：	那	飞机	是	来自	哪个	国家	？	美国	。
英：	那	美国	是	来自	哪个	国家	？	英国	。

为了更直观的展现对话中的句法共振，例 (3) 用对话图式来展现。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对话中词汇层面的共振，同时也能看到两句话中的句法层面的共振，因为从图中能看出英国代表是完全复用了美国代表话语中的句式，只是把个别词汇进行了替换。但是替换的部分在句子中的成份都没有变，属于十分对应的情况。

通过对收集到的语料进行分析, 依据定义对其进行分类:

	句子层面	词汇层面
英	22.62%	42.67%
美	7.14%	28.57%

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仅是词汇层面的对话共振占比较大, 因为在句子层面的对话共振情况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词汇共振。对于不同水平的汉语学习者来说, 都呈现出仅词汇层面共振情况比句子层面共振情况多的情况。且第二外语水平能力较好的人在句子层面的共振略高于第二外语水平较低的共振。本文认为产生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是: 相对于词汇层面而言, 句子层面的共振需要听话人对说话人产出的语言进行理解并分析, 在认知里进行识解, 并内化为自己而用。同时, 内化后需要将各部分的内容正确填到对应的句子结构中, 这就对说话人第二外语的水平有一定的要求。如果不能理解第一说话人话语中的句子构造, 或者是理解过后并不能将适合的词语填到对应的句子结构中, 也不能够形成句子层面的共振。而词汇层面的共振对说话者的第二外语的要求相对较低, 只需要说话者理解词汇的含义, 并且能正确运用即可。除此之外, 句子层面的共振占比较低的原因可能是说话人并不能够将第一说话人的话语句式运用在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中, 这就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能力限制。

本文从认知功能的视角出发, 依据对话不同的功能可以把共振分为不同的类型, 将收集到的存在对话共振的语料分为五类: 肯定、否定、修正、回应、质疑。

1. 肯定

对话共振中存在的第一种类型便是肯定。肯定指的是说话者通过重复另一名说话者话语中的部分内容, 借此表达他对于另一名说话者内容的赞同或肯定。在计算共鸣度时, 将对话依据中文字、词分为多个纵栏, 纵栏用字母表示。

例(4):

	A	B	C	D	E	F	G
甲:	你	们	都		相信	吗	?
英:	我	们	都	会	相信		。

这段谈话的背景建立在英国代表在分享英国圣诞节的一些习俗。英国代表谈到了小时候过圣诞节会把长袜挂在床头, 深夜便有圣诞老人将长袜塞满礼物或者木炭。此时节目的主持人提出了质疑: “你们都相信吗?”, 英国代表通过重复主持人话语中的字词来表达他对于这个

问题的肯定态度。整段对话中, 时态、形态句法、语义以及字词都存在共振的情况。由图中我们看出, 7个纵栏中有5个纵栏存在共振, 共鸣度为 $5/7=0.71$ 。其中, 标点也有被算入可能存在的共振部分。语料是口语转写的语料, 由于汉语口语的特点, 标点是转写者凭借生活经历和语感自行加上的, 这样就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位于句尾的标点符号和句中的标点不同, 句尾的标点在转录时还原度较高, 所以对话共鸣度的计算中也考虑了句尾的标点符号。

例(5):

		A	B	C	D	E	F	G	H	I
甲:	作为年轻人的话,		我	觉得		地铁		太	贵了	。
英:	对,	其实			伦敦的	地铁	真的	很	贵	。

这段对话的背景是对话双方在讨论英国的出行方式, 说话人甲发表了他的看法。随后, 英国代表复用了说话者甲的部分字词从而达到肯定的作用。对话中的关键信息“地铁”和“很贵”都在说话人的话语中得到了体现, 并且说话人还特意明确是什么地方的地铁很贵。该对话双方都采用了陈述句, 在句式层面也存在共振。这里存在一个特殊的情况, 即“对”是否算是存在对话共振的一部分? 我认为“对”与另一位说话人的观点产生语义共振, 但是在计算共鸣度时, 它并不能算是字词出现在纵栏里。所以共鸣度的计算仅针对于一段话中字词的共振, 而不包含其他方面。

整个对话被分为9个纵栏, 其中4个纵栏存在共振, 即对话共鸣度为 $4/9=0.44$ 。

例(6):

	A	B	C	D	E	F	G
甲:	不同的	美国人	有	不同的	开车	方式	。
美:	不同的	年代	有	不同的		方式	。

这段对话的背景是美国代表在介绍美国人开车时可能存在的一些行为。说话人甲并不赞同他所说的行为能够代表美国, 所以自己解释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开车方式。这样的解释也说服了美国代表, 于是他复用了说话人甲的大部分词语以及他话语中的句型, 表达出他对于甲观点的赞同。该对话图示中包括7个纵栏, 其中6个纵栏存在对话共振, 共鸣度为 $6/7=0.86$ 。基于以上的例子和收集的其他语料, 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在表示赞同的时候会增加比如“会”、“是”、“有”等表示肯定的动词, 或者选择不复用原说话人话语中存在的表示否定的词语, 比如“不”。

2. 否定

对话共振的第二种类型是否定。通过对语料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说话者会复用另一位说话者的一些内容或句型以表达自己对其观点的反对,或者选用复用的成分使用原词语的反义词来代替以表达否定原话的目的。

例(7):

	A	B	C	D	E	F	G	H	I
甲:	为什么			你	不	亮灯			?
英:		我	觉得	我	不	亮灯	很	正常	。

这段对话的背景是两位说话人就一个问题以亮灯或不亮灯的形式表明自己的态度。说话人甲认为英国代表应该亮灯表示支持该观点,但是实际上英国代表却没有亮灯,持反对观点。所以说话人甲对他的立场表示疑问,并采用疑问句的句式向他提问。英国代表复用了说话人甲话语中的部分内容,以反驳说话人甲认为他应该亮灯的观点,达到否定的作用。该对话被分为9纵栏,其中4个纵栏存在共振现象,可以计算得到对话共鸣度为 $4/9=0.44$ 。

例(8):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甲:		你		觉得				问	这	问	的	女	就	先	分	?
美:	其	我	们		在	美	国	不	会	问	这	个	问	题		。

在讨论两性关系时,对话双方就问题“如果我和你妈掉水里了,你会先救哪个?”展开了讨论。说话人甲在问另一位代表是否直接用行动代替回答,美国代表发表了他的想法,即“不会问这个问题”,直接否定了说话人甲的假设。在表达否定时,说话人还是复用了另一位说话人的部分字词,并在复用的字词前增加了否定词“不会”。从该对话图示中我们可以看出,该对话被分为16个纵栏,其中6个纵栏存在共振现象,对话共鸣度为 $6/16=0.375$ 。

例(9):

	A	B	C	D	E	F	G	H
甲:	全世界	最	有名的	地毯	是	波斯	地毯	。
美:		最	有名的	那个	是	阿拉丁的	地毯	。

各国代表在分享自己国家的特色产品,其中伊朗代表就提到了自己国家生产的波斯地毯,并且骄傲的认为自己国家生产的手工波斯地毯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而美国代表不赞同他的说法,采用替换的方式否定了他的观点。首先,在听到这句话时,美国代表在认知里对这句

话的句法进行解构。之后,他选择了复用原说话人的句子解构以及大部分的词汇。最后,为了表达他的不赞同,美国代表将关键的形容词“波斯”替换成了“阿拉丁的”,其他部分保留。虽然只是进行了词语的替换,最后的结果还是对原说话人进行了否定。

3. 修正

对于二语习得者而言,在使用第二语言时不免要犯错误。当对方纠正说话者错误的时候,二语习得者会出现一种重复对话话语的倾向,以修正他的发音或是词语的使用。这种情况下,往往说话者会完全复用另一位说话者试图纠正的字词,所以呈现出来的共鸣度也是较为客观的1。所以关于修正的例句,不再用纵栏划分的形式,只需将整个对话展现出来,并且用横线画出共振的部分即可。

例(10):

英: 有一个难民从伊朗过来, 去年...
甲: 难民从哪儿?
英: 伊朗。然后他就拿到了英国的那个...
甲: 居留权。
英: 居留权。很不容易就拿到了居留权。

在该例句中,英国代表无法准确表达出“居留权”的意思,所以在他的话语中用“那个”代替,同时语速变慢,显得有些吞吞吐吐。节目主持人在看出了他不知如何表达时,将那个词语直接抛了出来,希望能够帮助英国代表更加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英国代表直接复用了整个词语“居留权”,来修正他之前话语中表达不清的词语“那个”。

例(11):

甲: 枇杷汁也不能喝啊?
美: 就是很软软的东西。比如说粥, 或者是枇杷汁啊。
乙: 粥
美: 粥

在整个对话中,美国代表已经说出了他想要表达的东西“粥”。但是因为其发音不标准,被另外一位说话人纠正了发音,他用标准的普通话读出了“粥”的读音。此时美国代表也复用了这个词,模仿了另一位说话人的发音,修正了他自己对于“粥”这个词的发音。

4. 质疑

质疑是指一般情况下说话人在整个对话中复用另一位说话人的字词,并采用问句的形式以表达对原说话人话语的质疑,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复用另一位说话人的句式。

例(12):

	A	B	C	D	E
甲:	你	是	哪	一个	?
英:	我	是	哪	一个	?

在例(12)的对话中, 对话双方在分享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让大家猜照片对应的人是在场的哪位代表。对话发生的背景是说话人甲在看到照片时没能第一时间辨认出照片的所属, 所以提出了质疑“你是哪一个? ”。对于说话人甲的这一行为引起了英国代表的质疑, 质疑说话人甲怎么会认不出自己。所以英国代表对说话人甲的话语进行编码, 选择复用原句的句式以及大部分的词语, 产出自己的话语以表示对原句的质疑。两位说话人的话语之间因为复用而产生亲缘性, 从而产生对话共振。从该对话图示中我们可以看出, 整个对话被分为5个纵栏, 其中4个纵栏存在对话共振现象, 可计算出共鸣度为 $4/5=0.8$ 。

5. 回应

在很多情况下, 对话共振的出现并不具有以上所列出的肯定、否定、强调、修正四个功能。此时对话共振的出现只是简单的延续对话, 依靠说话人话语中的某一字词或部分词组而进行对话, 表达自己观点或想说的内容。

例(13):

	A	B	C	D	E
甲:		度数	高	不高	?
英:	这个	度数	40		。

在该对话中, 说话者双方在讨论英国代表带来的苦艾酒。主持人作为中国人对酒的度数比较敏感, 所以询问了介绍英国酒文化的英国代表酒的度数会不会很高。而英国代表也只是简答回答了他这个问题, 并没有赞同或否定, 也没有修正的功能。对话中有三个纵栏存在共振的情况, 其中C栏也被认为是存在共振的因为40度在多个文化背景中都代表着度数比较高的意思, 所以也可以看作是“高”的对应部分。因此在五个纵栏中有三个纵栏存在共振现象, 计算该对话的共鸣度为 $3/5=0.6$ 。

六、讨论

在这一章节, 我们对所统计的五十集节目中存在对话共振现象的语料进行了分析归类, 并计算其对话共鸣度, 得到表1:

表1 两位代表话语的对话共振分类

百分比	肯定	否定	修正	质疑	回应
美国代表	34.38%	9.38%	37.50%	9.38%	9.38%
英国代表	46.15%	19.23%	5.77%	5.77%	23.08%

先从横向看这个表格, 美国代表具有肯定和修正功

能的对话共振占比最大, 而英国代表的发言中具有肯定和回应功能的对话共振占比较大。二者共同的点都是表示肯定的对话占据了他们存在共振对话的多数, 在一定程度上反应说话人多复用他人话语产生对话共振以达到赞同的目的。由此可知在存在对话共振的对话中, 大部分都是由于说话人意于对另一位说话人话语的肯定。而在对另一位说话人话语表示质疑时, 则较少产生对话共振。

二者不同点是美国代表的对话中, 具有修正功能的对话占比最大, 而英国代表则占比最小。因为具有修正功能的对话共振产生的前提是说话人产出的某个词语或某个句式不符合第二外语国家的表达习惯, 所以在别人提醒后, 说话人会对自己之前说过的话进行修正。而他采用的修正的方式便是复用前一位说话人的词汇, 包括结构层次和语音层面上的共振。因为汉语水平能力的不同, 二者在产出具有修正功能的对话共振上的差异较大, 汉语水平较好的说话人, 产生错误词汇或发音的情况相对于汉语水平较差的说话人较少, 所以进行修正的情况也较少。

表2 两位代表各功能对话共振的平均共鸣度

平均共鸣度	肯定	否定	修正	质疑	回应
美国代表	0.63	0.66	1	0.20	0.45
英国代表	0.61	0.60	1	0.58	0.55

上表是两位代表不同功能的对话共振的平均共鸣度。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汉语水平不同的两位说话者总体来看差距不大, 一定程度上说明汉语水平的差异不一定能体现在说话者话语的共鸣度上。二者相差较大的是表示质疑的对话共振, 话语通常是疑问句, 这样句式的变化就要求说话人对语言有更好的掌握能力。基于二语习得者对于第二外语的掌握程度, 他在与他人对话时, 能更好的产生对对话的认知, 选择复用的部分, 在认知中产生更多的亲缘性感知, 对话共鸣度更高。第二外语水平较好的习得者比较差的习得者在实际对话中更容易产生类比, 更容易将自己已知的知识投射在未知的领域, 所以共鸣度也可能会相对更高。因为两位说话者的总体对话共鸣度相差不大。二者相差较大的体现于具有疑问功能的对话共振上。笔者认为具有质疑功能的对话共振的产生相较于肯定或否定是比较有难度的。肯定或否定的对话共振可以不对原句的句式作出改变, 只需要增加、减少或修改一些词语即可。

七、结语

本文以真实的语料为基础, 从认知功能的角度下对

汉语水平不同的二语习得者的对话共振现象进行分析。发现除延续回应的基本功能外,汉语水平较好的二语习得者的对话共振多倾向于肯定和回应的功能,而汉语水平较差的二语习得者的对话共振多倾向于肯定和修正,否定则是其对话共振中最少概率的功能之一。就对话共鸣度而言,汉语水平较高的二语习得者和汉语水平较低的二语习得者在对话中整体的共鸣度差距不大,二者只在具有质疑功能的对话共振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启示我们在教授第二外语时,可以试图引发学习者的对话共振,以期起到促进语言学习的作用。

基于此,本文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共鸣度仅局限于句子层面的对话共振,且产生共振的部分只能是字词、语音语调,不包括其他层次的共振或者动作共振。用共鸣度作为研究的依据,只能反应说话者话语中所用的字词,所以用共鸣度来表示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次,本次研究收集的语料是节目中的对话,可能与真实的对话存在一些差异,且在节目中的自然对话在整个节目中的占比较小,所以在统计结果时并不能做到较大的语料量,得出的结论可能也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最后,对话共振的统计和对话共鸣度都只能人为统计和计算,所以可能会存在一些偏差。本文基于现实语料分析了对话共振的特征,并试图为今后的对话句法研究以及外语教学提供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1]Du Bois, J.W. 2014. Towards a dialogic syntax. *Cognitive Linguistics* 25(3): 359-410.

[2]董菁, 钱玲燕, 陈琦.对话句法视域下的回声话语研究——以医患话语为例[J].*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

学报), 2021, 44 (04): 53-65.

[3]高彦梅.对话共鸣与衔接和谐[J].*现代外语*, 2018, 41 (03): 320-332.

[4]胡庭山, 孟庆凯.认知-功能视域下的对话句法:理论与应用[J].*外语研究*, 2015, 32 (06): 17-21+41. DOI: 10.13978/j.cnki.wyyj.2015.06.004.

[5]冷玉芳.对话句法: 认知功能视角下的会话研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51 (06): 161-164.

[6]刘兴兵.DuBois对话句法理论中体现的巴赫金对话理论思想[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6, 24 (01): 21-25.DOI: 10.16362/j.cnki.cn61-1457/h.2016.01.005.

[7]刘兴兵.对话句法理论目前存在的问题[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1 (03): 26-34.

[8]刘兴兵.对话句法: 理论与意义[J].*外国语文*, 2015, 31 (06): 63-69.

[9]孙李英.基于形式介入的会话含意推导: 对话句法视角[J].*现代外语*, 2021, 44 (01): 13-24.

[10]王德亮.对话句法: 认知功能主义对会话分析的最新探索[J].*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7, 40 (02): 51-61.

[11]王德亮.论对话句法共鸣[J].*当代语言学*, 2018, 20 (02): 214-229.

[12]王天翼, 甘霖.对话句法学之再认识[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8 (06): 78-85+146. DOI: 10.13458/j.cnki.flatt.004544.

[13]曾国才.认知语言学前沿动态——对话句法学初探[J].*现代外语*, 2015, 38 (06): 842-848+874.